

大连考古文集

第一集

大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编



科学出版社

大连考古文集

(第一集)

大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编

科学出版社
北京

内 容 简 介

《大连考古文集》（第一集）收录了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国内考古学者和大连文物考古工作者的学术论文和发掘报告共 49 篇。收录的论文从旧石器时代到明清，主要偏重于新石器和青铜时代考古学研究，汇集了大连地区考古学研究的重要成果，是了解和研究大连地区考古学文化必备的专业学术文集。

本书可供考古学、历史学研究者及高等院校相关专业师生阅读、参考。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连考古文集·第1集 / 大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编. —北京：科学出版社，2011.6

ISBN 978-7-03-031131-3

I. ①大… II. ①大 … III. ①文物 - 考古 - 大连市 - 文集
IV. ①K872.313-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92370 号

责任编辑：王光明 / 责任校对：李 影

责任印制：赵德静 / 封面设计：谭 硕

科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 16 号

邮政编码：100717

<http://www.sciencep.com>

中国科学院印刷厂印刷

科学出版社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11 年 6 月第 一 版 开本：787 × 1092 1/16

2011 年 6 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27 1/4

印数：1—1 500 字数：631 000

定价：16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大连考古文集》（第一集）

编辑委员会

主任 王星航

副主任 王家胜

主编 韩建宏

副主编 王 宇 张志成 张翠敏

编辑 范 磊 申 霞 刘美晶 刘金友

序

《大连考古文集》（第一集）付梓出版了，我感到十分欣慰。《大连考古文集》（第一集）收录的文章是从对大连地区考古学文化颇有研究的国家、省及本地文物考古工作者的大量学术论文中精选出来的。按时代排序，从旧石器时代至近代，集中了一批新中国成立以来大连地区优秀考古研究成果，概略印证了具有 17000 年历史的大连地区久远厚重的古代文明和文化风貌，为文物考古工作者、文物爱好者以及广大社会民众了解、认识、研究、热爱大连，共同建设文化名城提供了宝贵的学术资料。

大连考古起步早，学术成果丰富。早在 19 世纪末就有日本人在大连地区进行考古活动，囿于当时的社会状况和学术水平，尽管为我们留下了一些资料，也留下了不少遗憾。新中国成立后，大连地区的考古有了稳步的发展，有目的专题性的考古活动陆续展开，大连地区发现的距今 17000 年的古龙山旧石器时代洞穴遗址，具有新石器时代坐标意义的小珠山遗址，具有青铜时代坐标意义的双砣子遗址、大嘴子遗址和双房遗存，大连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至青铜时代晚期的积石墓、石棚、石棺墓等是东北地区独具特色的遗址和墓葬形式。新石器和青铜时代考古是大连地区考古活动中的重点内容之一，是广大文物考古工作者着重研究的对象，在中国考古界占有一席之地。大连地区汉代考古又是一大亮点，内涵丰富，分布广泛、数量众多的汉墓和大量的出土文物揭示了汉代大连的辉煌和进步。汉代以后直至近代的物质文化遗存，则更多地体现了大连地区多元的兼收并蓄的文化特征和绵延不断的历史文脉。

我从《大连考古文集》（第一集）看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大连的考古工作者不懈努力的身影。20 世纪 50 年代初到 90 年代，旅顺博物馆曾主持大连地区的考古工作。1994 年大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成立以后，担负起了全市地上和地下文物保护、勘探、发掘工作。几十年来，或与国家、辽宁省的考古机构合作，或独立进行了长海县小珠山、吴家村、上马石，旅顺口区郭家村、于家村、大潘家、王家村、大砣子，甘井子区的营城子，普兰店市双房、张店，金州土龙子等众多的遗址、墓葬、城址的考古发掘。先后出版了《大嘴子》、《大连土羊高速公路发掘报告集》、《大连文物概览》等学术专著，发表了“长海县广鹿岛大长山岛贝丘遗址”、“大连市郭家村新石器时代遗址”、“辽宁省瓦房店市长兴岛三堂村新石器时代遗址”、“新金双房石棚和石盖石棺墓”、“营城子贝墓”等考古发掘报告、发掘简报以及学术论文，这些科研成果凝结着广大文物考古工作者的辛劳和智慧，不仅有考古的辛勤劳动实践，而且上升为理论研究，为大连的文化增光添彩，我感到更有意义。

近年来，大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和突出的工作业绩，特别是在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工作中，荣获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实地文物调查阶段突出贡献

集体奖”光荣称号。

值此《大连考古文集》（第一集）出版之际，谨向多年来一直关心大连考古工作并卓有建树的全国各地专家学者表示诚挚的感谢！向大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取得的成绩表示祝贺！衷心祝愿广大考古工作者在今后工作中取得更大成绩，不断有新的学术成果问世。

大连市文化广播影视局
(新闻出版和版权局、文物局)
党委书记、局长

目 录

序	王星航 (i)
大连古龙山洞穴文化遗物及对当时古生态环境的探讨	尤玉柱 李 蓝 孙玉峰 王家茂 (1)
辽东半岛的史前文化	安志敏 (9)
试论大连地区新石器和青铜文化	许明纲 (18)
辽宁“环渤海考古”的新进展——1990年大连环渤海考古会后	郭大顺 (35)
辽东半岛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的再认识	苏小幸 (44)
辽东半岛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区系类型以及与周边文化的关系	张翠敏 (51)
郭家村下层新石器的考察	佟柱臣 (66)
略谈郭家村新石器时代遗址	许玉林 苏小幸 (72)
瓦房店交流岛原始文化遗址试掘简报	王 琛 陈国庆 刘俊勇 (77)
大连地区筒形罐谱系研究	许明纲 (86)
史前辽东半岛经济形态研究	刘俊勇 (94)
辽东半岛南部农业考古调查报告——植硅体证据	靳桂云 栾丰实 张翠敏 王 宇 (110)
大连地区史前开发史初探	苏小幸 (122)
从考古发现看大连远古渔业	于临祥 王 宇 (130)
大连与山东地区原始文化的发展与异同	王 宇 王珍仁 (137)
再论千山和龙岗山脉在辽东考古学文化分区上的意义与高句丽起源	王绵厚 (144)
大连地区早期青铜时代考古文化	陈国庆 华玉冰 (163)
大连地区晚期青铜时代考古文化	华玉冰 陈国庆 (170)
大连地区青铜时代彩绘陶研究	许明纲 (176)
大嘴子青铜时代遗址的学术价值	佟柱臣 (184)
大嘴子遗址炭化稻米的考察与研究	吴青云 (189)
大嘴子第三期文化聚落遗址研究	张翠敏 (194)
辽东半岛的贝丘、积石冢与大石棚文化	王禹浪 崔广彬 (209)
大连古代石筑墓葬研究	许明纲 (217)
大连地区积石墓浅见	张志成 (232)
辽东半岛积石冢研究	王嗣洲 (237)

辽东半岛石棚之研究	许玉林 (259)
辽东半岛石棚性质初探	曲传林 (267)
辽东石构墓葬的类型及相互关系	徐光辉 (273)
论中国东北地区大石盖墓	王嗣洲 (281)
双房遗存研究	王 巍 (296)
以陶器为视角的双房文化分期研究	赵宾福 (305)
大连地区曲刃青铜短剑遗存研究	刘俊勇 (323)
辽宁大连市土龙子青铜时代积石冢群的发掘	吴青云 (329)
旅大市所启封戈铭的国别、地理及其相关问题	黄盛璋 (339)
论大连地区汉墓在东北考古学史上的地位	韩建宏 (341)
略论大连汉墓形制	曹 钧 (348)
大连汉墓研究	刘美晶 (355)
从营城子汉墓壁画看神学迷信与谶纬思想对汉画的影响	葛 华 (361)
大连营城子汉代墓群发掘简报	吴青云 (365)
辽宁大连刘家屯西汉贝墓	刘金友 王兆强 (370)
大连沙岗子农科院汉墓发掘简报	刘金友 闫永生 (376)
试述哈斯罕关址的若干问题——兼谈曷苏馆诸名称及其来源	陈钟远 (384)
辽代“镇东海口”长城调查考略	冯永谦 (389)
辽代苏州城址初探	陈钟远 (400)
大连地区金代铜钱窖藏研究——兼论金代的货币经济	吴青云 (403)
大连地区明代军事设施遗存刍论	范 磊 佟 强 (412)
金州石家沟明代假葬墓	张松石 (418)
大连近代建筑综述	刘美晶 (420)
后记	(426)

大连古龙山洞穴文化遗物及对当时古生态环境的探讨

尤玉柱 李毅 孙玉峰 王家茂

—

古龙山在大连市复县镇郊北侧，其地理位置为北纬 $39^{\circ}41'$ ，东经 $122^{\circ}01'$ （图一）。古龙山山体均由古生代寒武纪石灰岩构成，因石灰岩的质地较纯，多年来一直生产石灰。1981年当地建材工人在采石时发现了一个小型洞穴，洞穴中的堆积物埋藏着极其丰富的脊椎动物化石。大连自然博物馆有关人员从当年起进行了两度发掘，据初步统计，所获材料有：各类脊椎动物化石数万件，经人工敲击的兽骨片数百件，以及少量经人工打击过的石制品。1983年，笔者等又在这一地点进行了地质观察。

古龙山洞穴是辽宁省南部地区首次发现的脊椎动物化石和有文化遗物的地点，其出土的化石数量、种属之多，在东北地区是罕见的，而在我国各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或更新世晚期化石地点中也是少有的。因此，这一地点的脊椎动物化石和文化遗物的研究，必将对我国华北、东北广大地区更新世晚期的人类活动、动物的迁徙与演化，以及自然环境的变化的探讨，提供十分重要的依据。

古龙山洞穴的现存部分总长60余米，大致沿水平方向延伸，从横断面看，洞穴呈上宽下窄的倒梯形，最宽处约1.2米，最窄处不足半米。洞内石钟乳、石笋、石花和石帘都十分发育，说明其形成已有相当长的时间。洞内堆积物的岩性比较单一，基本上由黏土组成，根据颜色不同，胶结紧密程度和所含砂量的多寡，又可细划为四个小层（从上到下）：

(1) 深红色黏土，黏结性很强，含丰富的脊椎动物化石，石化程度较高，化石表面通常呈黑色或褐黑色，厚0.6米。



图一 古龙山地点地理位置

1. 山西朔县峙峪遗址 2. 山顶洞遗址 3. 吉林榆树地点 4. 大连复县古龙山地点 5. 辽宁丹东前阳地点

(2) 黄色黏土，较疏松，本层靠上部含有大量化石，厚1.4米。

(3) 灰黄色黏土，少含化石，厚约1米。

(4) 淡黄色黏土，含少量细砂和砂岩碎块，靠底部有丰富的化石，厚约1米。

堆积物中的第一层深红色黏土，岩性上与洞外高阶地上的黏土很相似，应属同期产物。据野外观察和初步鉴定的脊椎动物化石组合判断，洞穴中的堆积物时代为更新世晚期。经¹⁴C年代测定，第一层为距今 17160 ± 240 年前。另外，用釉系法进行年代测定结果是：第二层和第三层之间为距今20000年前；第四层为40000年前。因此，可以确定洞穴堆积物沉积的时间为40000年前至17000年前，延续的时间约23000年。年代测定和脊椎动物化石组合的判断没有矛盾。

二

文化遗物只有石制品和骨制品。虽然从古龙山洞穴出土的文化遗物的数量很少，但都具有清楚的人工打击痕迹。毫无疑问，远古人类曾经在两万年前至四万年前间生活在古龙山一带。

1. 石制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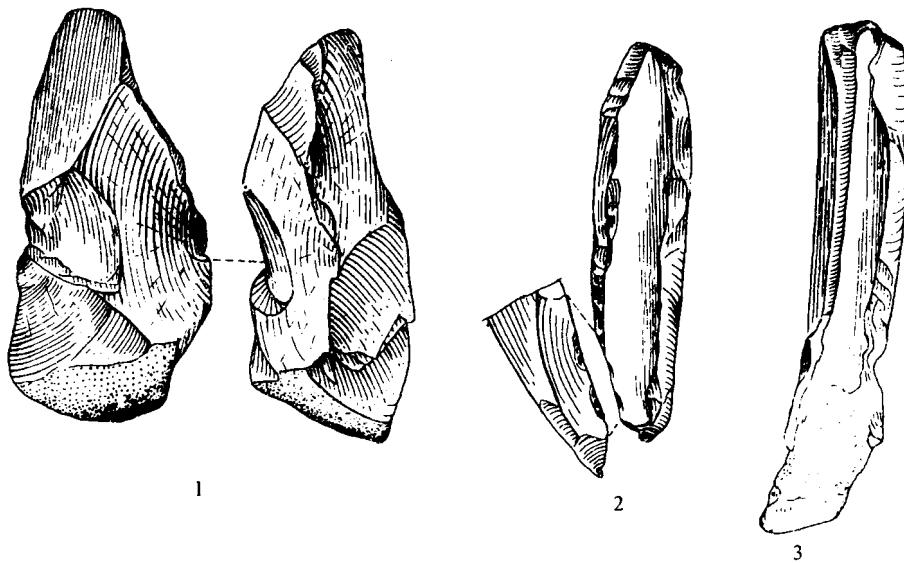
石制品只有两件。一件是石核，编号：DMP82001号，原料为浅紫色石英岩，岩石属再变质，故致密，硬度亦大。从保留下来的岩石表面观察，可能采自河流中的砾石。该标本大致呈六面体，长、宽、厚为59、45、42毫米。其中有两个面留有原砾石面，另外四面都有剥落石片的痕迹。从遗留的痕迹看，打击点不甚清楚，放射纹明显，没有修理台面，打片时直接利用原砾石表面为台面打片或打片后作台面再打片的。这种石料难以生产长薄石片，故打下的石片多是宽大于长或长宽相等者。另一件为半边石片，编号：DMP82002号，原料也是浅紫色石英岩（图二，1）。所谓半边石片，即原为一较大石片，因在打制该石片时，沿着打击点纵向裂开而使石片一分为二。该半边石片在剥落之前，它的两面曾打过石片而留有三个石片疤，剥落后又有打击较小石片的痕迹，因此除了背部后端留有原砾石面外，其余各部都有打击的痕迹。这也说明这一地点生活的远古人类，在攫取石料困难的条件下充分利用石核和石片。鉴于这个地点所发现的石制品太少，也未见第二步加工的石器，故其文化性质尚难了解。

2. 骨制品

具有清楚的人工敲击痕迹的兽骨片计数百件，一般长度约15厘米，只是兽骨有不同的种类，且有宽窄的不同。但是这批骨制品具有的共同特点是：骨片带有一个尖，其尖头相对的另一端较钝或截平；有的骨片两端都是尖头。尖状部分有人工加工的痕迹。自然破碎的骨片基本上沿骨质纤维方向裂开；食肉类动物和啮齿类动物啃咬的骨片具有齿痕。古龙山洞穴出土的骨片（骨制品）则是人类用石头敲击的。

标本 D82093 号是由鹿的掌骨劈开后再经加工而成的骨制品，它的后部较平，保留了原掌骨的近端，而前部修成一个尖头，制作方法与旧石器时代晚期常见的尖状器类同。值得注意的是在离后部约 2 厘米的位置上，两侧都有从骨面向骨内壁方向打的一个缺口，我们推测这种打击的目的很可能是为了便于将骨制品安在木棒前端作捆绑之用。另一件标本 D82089 号是用兽骨（管状骨）劈开修制的，形态和加工方法与上述标本很相似，前端尖头部分在骨面和骨内壁上都有轻轻敲细琢的痕迹，底端也较平，在距底端大约 3 厘米处，两侧也各打出一个缺口，但是从骨内壁向骨面方向打击（图二，3）。这类骨制品还有一定数量，这种重复出现的现象正好说明当时居住在古龙山的远古人类打制骨片是有一定目的的。

V 820009 号和 V 820002 号标本（图二，2），实际是两件骨制尖状器。两者都是两头带尖，尖端都经打击而成，所不同的是前端尖部经过加工，或是由骨内壁打击，或是错向打击而成的。



图二 古龙山洞穴出土的文化遗物

1. 半边石片 2、3. 骨制品

近年来，我国有许多旧石器时代遗址和地点出土骨制品。例如：山西朔县峙峪遗址^①、辽宁金牛山遗址^②、吉林榆树地点^③等。其中最多的是山西朔县峙峪遗址，经人工打击的骨片和修制成器的竟达一万余件。据研究，峙峪人砸击肢骨和肋骨不在于吸

① 贾兰坡等：《山西朔县峙峪旧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2 年 1 期。

② 金牛山联合发掘队：《辽宁营口金牛山旧石器文化的研究》，《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16 卷 2 期。

③ 孙建中等：《吉林榆树周家油坊旧石器文化遗址》，《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19 卷 2 期。

髓，骨制品除用于刮削之用外，还用来作为打制石片时的棒状中介物^①。然而大连复县古龙山地点的骨制品看来不是作为打制石片时的棒状中介物，因为在当时当地的自然条件下，更多的可能性是用于狩猎，以弥补石料不足这一地理上的缺陷。

值得一提的是，出土的一件大型兽骨（标本 V 821183 号），骨面上有许多长条状凹坑，形成原因不明，但在一棱嵴上，六条相互平行的砍砸痕迹是清楚的，这种砍痕可能是没有目的的，但可以认定是人工所为。在一些兽骨片上也有人工刻划的痕迹，但不如峙峪遗址的多而复杂^②，且痕迹浅短，不是记号和符号。

就地貌上看，古龙山属于一个低丘，海拔仅百余米，源于瓦房店的回头河流经它的南侧、东侧而向北。据现存洞穴的大小和延伸情况推测，这不是人类居住的地点，居址应在稍靠南的位置，现存洞穴只是支洞。由此看来洞穴的主体部分已被破坏，这也许是文化遗物发现不多的原因。古龙山低丘突兀孤立于山间冲积平原之中，而且坐北朝南，是很适宜人类居住和活动的场所。据分析，我国华北和东北广大地区，旧石器时代遗址和地点在时空的分布上是有一定的规律性的。一般来说，露天遗址（即洞外遗址）往往分布在地区性第二、第三级河流的交汇处，依山傍水，地势开阔。晚期旧石器遗址常在第二级阶地的中、下部；中期旧石器遗址在第三级阶地的中、上部；早期旧石器遗址在第三级阶地的下部和第四级阶地上。洞穴遗址随洞穴高程变化而时代不同，时代越老的洞穴位置越高。但它们往往是在平原、盆地和山体的交界处，尤其是低山、丘陵伸入平原、盆地之中的前端^③。古龙山洞穴地点便是这种情况。据目前掌握的资料分析，古龙山洞穴（已破坏的部分）在旧石器时代晚期曾经是人类生活过的地方，而现存洞穴中的大量化石绝大多数是当时人类废弃的遗物，堆积物则是长期地下水水流作用的结果。

三

恢复与重建远古人类生活的自然环境，是考古学中的一项重要课题。解决这一课题的常规方法，通常是利用该遗址出土的文化遗物、动物群、孢子花粉和沉积物中的矿物组合进行综合性分析。但是自然条件的恢复和重建，最主要的是通过对古生物的生态研究。古龙山洞穴出土的大批脊椎动物化石和孢粉的鉴定，为我们进行这一研究提供了可靠依据。鉴于这个地点时代较晚（更新世晚期），动物群的基本面貌是现代化的（绝灭种较少），因此我们按照古代的和现代的动物地理相结合的原则，对古龙山动物群做一剖析。

古龙山动物群共有 62 种，包括鸟类 7 种，鱼类 2 种，爬行类 1 种，哺乳类 52 种。其中的哺乳类可以按照自然区和温度带在一定历史时期内对动物分布的阻碍和限制作用

① 尤玉柱等：《关于峙峪遗址若干问题的讨论》，《考古与文物》1982 年 5 期。

② You Yuzhu, 1982: Preliminary study on Paleolithic bone engraving in Shiyu, Shanxi Province. Quaternary Geology and Environment of China. Oce an Press.

③ 尤玉柱：《论华北地区旧石器晚期遗址的分布及地质时代问题》，《人类学学报》3 卷 1 期。

的原则^①，分成如下几个类群：

(1) 适应性很强的世界性或旧大陆广泛分布的类群，有 8 个属种：

狼 (*Canis lupus*)

沙狐 (*Vulpes corsac*)

熊 (*Ursus sp.*)

棕熊 (*Ursus arctos*)

虎 (*Panthera tigris*)

豹 (*Panthera sp.*)

野猪 (*Sus scrofa*)

野兔 (*Lepus sp.*)

(2) 对自然条件有一定的选择，基本上生活在温带的类群：

① 喜干草原和开阔草原地形的类型，有 17 个属种：

柯氏鼠兔 (*Ochotona kolowii*)

达乌尔鼠兔 (*Ochotona daurica*)

鼠兔 (*Ochotona sp.*)

阿曼鼢鼠 (*Myospalax armandi*)

东北鼢鼠 (*Myospalax psilurus*)

方氏鼢鼠 (*Myospalax fontanieri*)

鼢鼠 (*Myospalax sp.*)

黄鼠 (*Citellus sp.*)

艾虎 (*Mustela eversmanni*)

鼬 (*Mustela sp.*)

马 (*Equus sp.*)

蒙古野驴 (*Equus hemionus*)

普氏野马 (*Equus przewalskii*)

河套大角鹿 (*Megaloceros ordosianus*)

恰克图转角羚羊 (*Spirocerus kiahtensis*)

普氏羚羊 (*Gazella przewalskii*)

羚羊 (*Gazella sp.*)

② 喜潮湿森林草原或灌木地带的，有 20 个属种：

小家鼠 (*Mus musculus*)

黑鼠 (*Rattus rattus*)

田鼠 (*Microtus sp.*)

普通刺猬 (*Erinaceus europaeus*)

^① 中国科学院《中国自然地理》编辑委员会：《中国自然地理》(动物地理)，科学出版社，1979 年。

似北豺 (*Cuon cf. alpinus*)
 豺 (*Cuon sp.*)
 黄鼬 (*Mustela sibirica*)
 真獾 (*Meles sp.*)
 似狗獾 (*Meles cf. meles*)
 最后鬣狗 (*Crocuta ultima*)
 小野猫 (*Felis microtis*)
 鹿 (*Cervus sp.*)
 加拿大马鹿 (*Cervus canadensis*)
 东北马鹿 (*Cervus xanthopygus*)
 东北斑鹿 (*Cervus manchuricus*)
 东北麂子 (*Capreolus manchuricus*)
 王氏水牛 (*Bubalus wangi*)
 水牛 (*Bubalus sp.*)
 原始牛 (*Bos primigenius*)
 家牛 (*Bos taurus*)

(3) 对温度敏感的、生活于北方区（寒带和寒温带）的类群，有3个属种：

真猛犸象 (*Mammuthus primigenius*)
 披毛犀 (*Coelodonta antiquitatis*)
 猛犸象 (*Elasmotherium sp.*)

(4) 基本上生活在热带、亚热带的类群，有2个属种：

蹄蝠 (*Hippopotamoides sp.*)
 猎豹 (*Acinonyx sp.*)

(5) 属于特殊自然条件生活者，有2个属种：

水獭 (*Lutra sp.*)
 骆驼 (*Camelus sp.*)

从上面列出的五种不同自然条件的类型看，充分证明当时复县古龙山一带自然环境的复杂性。但总的看来，以第2类对自然条件有一定选择性，基本上生活在温带的类群占绝对优势，总共有37个属种，占全部哺乳类的71%，这说明在更新世晚期，大约在40000年至17000年前，大连复县一带处于温带草原—森林草原的自然景观，大致与当今松辽平原—大兴安岭交界地带的环境相仿。古龙山动物群中的有蹄类有20个属种（约占40%），啮齿类12个属种（占23%），它们基本上在草原或草原边缘地带生活，加以它们化石数量很大（几乎占90%以上），足见当时有相当广阔的草原。林栖动物有15个属种，约占29%，可推测处于长白山脉南延部分的复县古龙山附近的山地，确也分布着一定面积的森林。

各层洞穴堆积物均进行了孢粉分析，所含孢粉数量有明显的自上而下逐渐减少的趋

势。孢粉以草本植物占优势，其含量高达 95%，以菊科中的蒿属为最多（占总数的 80%），其他的有豆科、十字花科、禾本科、蓼科、藜科、莎草科、桑科和荨麻科。蕨类植物仅见紫萁和石松。木本植物相当贫乏，只占总数的 4%，包括松、栎、柳、椴和桦属等。孢粉组合反映以草原为主、森林为次的稀树草原景观。

根据目前中国植被区划^①，大连复县一带属于暖温带落叶阔叶林带，而辽西和吉林西部为温带草原地带。从上述脊椎动物化石和孢粉组合资料对照，当时古龙山一带显然与今不同，如果按松辽平原西部自然条件推算，过去的年平均温度大约为 3~6℃，比现在当地低了 3~4℃；年平均降雨量均为 400 毫米，比现在低 200 毫米左右。动物群中喜冷的北方型动物（猛犸象、披毛犀和猞猁）及喜暖的南方型动物（蹄蝠和猎豹）意味着夏天温暖而冬天相当寒冷。

四

动物考古学的任务不仅仅在于通过对某一遗址或某一地点采集的动物化石的鉴定来探索当时当地自然条件和古生态环境，而且还要帮助解决其他一系列问题。例如：该遗址或地点被占用的时间，是否属于长期居住的，还是有季节性的；远古居民的狩猎对象与狩猎方法；以及他们生活的主要来源和自然界为此提供的这种来源的丰富程度等。用动物学的基本原理和野生动物生态学的观点和方法解决这些问题的工作，在我国才刚刚开始。古龙山动物群使我们有机会进行这一尝试。

古龙山洞穴发掘的 62 种脊椎动物化石，绝大多数是以肢骨和单个牙齿的状态而保留下来的，完整的头骨很少。初步统计表明，不同属种个体数量的差别是非常明显的，只有四种的数量很多，即是马类、犀类、鹿类和最后鬣狗。其他属种数量有限。马类的数量达到惊人的程度，据不完全统计，马类牙齿共六七千枚，其中颊齿（包括臼齿和前臼齿）不少于 5000 枚。如果按照一匹马（或驴）颊齿数为 24 枚计算的话，那么古龙山洞穴出土的马和驴至少有 200 个个体。如此众多的马类化石个体数量，在国内外旧石器时代遗址和化石地点中是不多见的。我国华北地区有两个遗址产马类化石很多：山西朔县峙峪遗址和许家窑遗址。前一遗址出土的马类颊齿数以千计，经分类统计，马的个体数至少代表 130 匹，野驴至少 90 头，合计马类个体数 220 匹^②。许家窑遗址大约千枚，远不如峙峪和古龙山的多。古龙山地点数量众多的马类牙齿化石只能说明，当时生活在这里的人类，也像峙峪人那样，以马类作为最重要的狩猎对象和食物来源；其次的狩猎对象便是犀、鹿和最后鬣狗，偶尔猎取其他大、中、小型的兽类。

当时生活在古龙山一带的居民们是一群以狩猎为生者，他们以肉食为主，因为当时当地的生态环境——广阔的草原和一定面积的森林，为人类提供了大量的有蹄类动物的食物来源，而采集经济必然降到从属的地位。

① 吴征镒等：《中国植被》，科学出版社，1980 年。

② 尤玉柱等：《关于峙峪遗址若干问题的讨论》，《考古与文物》1982 年 5 期。

确定一个遗址或某一暂时居住的地点被人类占用的时间是史前考古学的有趣问题。近年来北美考古学家为探讨史前遗址被占用的时间做了不少有益工作，并研究出一些新的途径。如采用对动物牙齿进行显微镜下的切片观察，分析齿质生长层（线），以此来判断那些动物的死亡季节或于哪一季节被人类所杀戮。尽管通常利用动物牙齿萌出的顺序时间和骨骺生长情况、骨缝愈合程度等作根据，但不如显微观察准确和切实可行。

我们对古龙山地点的分析，用切片观察和动物生态相结合。通过对马类牙齿切片的初步观察，它们的死亡时间可能主要在夏季，因为齿质的生长层（线）最外部呈现白色半透明状，而通常齿质生长在冬季则是暗色的。另外，这里的马类牙齿化石大部分牙齿冠部长，是青年个体者，而老年个体的甚少，这就从另一角度证明死亡的原因不是自然淘汰因素，而是人类捕杀的可能性更大。

脊椎动物化石中，鸟类计有七种，即鸭、隼、榛鸡、山鹑、雉、鸽和鹬。鸟类是对气温很敏感的动物，其对探索遗址被占用时间或季节的特殊作用尚未引起重视。据现有资料记载^①，鸭和雉是遍布全国的种类；山鹑只分布于东北和华北的山地；榛鸡现今只在黑龙江和吉林长白山山地，常栖息于森林之中，能耐寒，冬季喜藏于雪下过夜。这四种鸟类在一年四季里都可在大连复县地区出现。而隼、鸽和鹬三种则为夏候鸟或旅鸟，在复县地区的出现是有其季节性的。隼在夏季普遍分布于我国东北和华北一带，迁徙途径经华南、印度等地，于冬季在非洲东部越冬；鸽和鹬是旅鸟，春、秋季节只是沿海滨路过大连一带，冬季都返回热带地区过冬。鸟类化石提供的事实表明，隼、鸽和鹬在古龙山死亡的时间只能是春—秋季，而不会是冬季。

综合上述事实使我们做出这样的初步推测：占用古龙山洞穴的远古人类，很可能是春暖花开时节，从华北某地迁徙或跟踪某些类群的动物而来到这里的。他们在古龙山附近，由于这里有取之不尽的肉食原料，使他们得以在广阔的草原上过着以狩猎为主的生活，度过春、夏、秋季，在冬天即将降临之前离开这里返回原地。他们这种春来冬去的游猎生活曾持续了一个相当长的时间。

（原载《史前研究》1985年1期）

尤玉柱、李毅，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
孙玉峰、王家茂，原工作单位大连自然博物馆

^① 郑作新等：《中国动物图谱》（鸟类）第一、三册，科学出版社，1959年。

辽东半岛的史前文化

安志敏

一、引　　言

辽东半岛东临黄海，西濒渤海，南与胶东半岛隔海相望，北接东北大陆。从自然地理学的角度上，辽东半岛与胶东半岛被划入华北的一个亚区，因为它们无论在地质构造上或气候湿润程度上都有很大的相似性。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亘古以来辽东半岛便成为南北交流的天然孔道。

辽东半岛史前考古的探索，具有将近百年的历史，在被日本占领统治的四十余年间，辽东史前文化始终若明若暗，其基本轮廓和文化谱系也不像黄河流域那样明确。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全面普查的基础上，对遗存的种类和分布有了更明确的了解。特别是60年代以来的大规模发掘，随着一系列地层关系和考古资料的发现，对辽东史前文化的基本内涵、年代序列以及同邻近地区的交流关系，均获得崭新的认识。特别是具有地域性的史前文化有着明确的继承发展阶段，又表现出南北因素的交替影响，甚至存在着不同的文化谱系。从文化交流上，既有来自胶东的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和岳石文化的诸项因素，又有来自东北大陆以连续弧形纹筒形罐为代表的遗存或青铜文化的影响，毕竟是以土著文化为主流，有着浓厚的地域色彩。

二、研究史的回顾

辽东史前考古学的研究开展较早，这种以调查发掘为主的田野活动，完全不同于书斋式的古器物研究，标志着已进入现代考古学的范畴。当被日本占领统治时期，由于政治上的束缚，限制了这门学科的发展，中国人民未能过问其事几达半个世纪之久。随着新中国的成立，考古学才真正回到人民的手中，开始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今昔对比自然是后来居上，但过去的工作基础也不容忽视。其发展过程，可分为下列四期：

1. 萌芽期（1895～1927年）

本期的特点，是限于小规模的个人活动。甲午战争之后，日本的鸟居龙藏曾在1895、1905和1909年三次来辽东调查，当时是以人类学的考察为主，也兼及民俗学和考古学。1895年仅在析木城发现两座石棚和在熊岳城、貔子窝采集到个别的磨制